

# 试论农民工报道中传播者的 偏见与歧视现象

□ 许向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近几年,我国传媒关于农民工报道在数量上持续增加,报道中却存在着偏见、歧视等现象。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影响、传媒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以及从业者缺乏职业道德等因素,造成了这类传播现象。

[关键词] 农民工;报道偏见;新闻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近几年,农民工报道在数量上与日俱增,究其原因不外乎该人群数量的庞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农民工本身的特质赋予的新闻价值等因素。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农民工报道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传媒在关注着该群体,为该群体的合法权益呼吁;另一方面在报道中却存在着偏见、歧视和冷漠等现象。

## 农民工报道中的偏见、歧视 和冷漠

通过对大量农民工报道的分析,笔者发现农民工多是在讨薪、维权、行为失范、被救助等状况下,或者事态发展到相当严重时才被媒体报道的,因为此时的新闻内容更具人情味、新奇性,而偏见、歧视和冷漠等媒体失范行为更多地出现在此时。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把偏见概括为一种“对属于某一集团的人所产生的厌恶,甚至

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这个人属于某个集团的一员,因而这个人也就具有这个集团所有的令人不愉快的特征”。<sup>[1]</sup>在许多社会场合,持偏见者做出判断时往往所依据的是固定的、简单化的臆想,一些新闻媒体也存在这种弊病。广东一家报纸和国内一家官方网站曾经报道过“百万安全套送给外来妹”的新闻。该报道有两个明显的炒作热点:一是安全套,二是打工妹。安全套涉及个人隐私问题,用不用,怎么用是不宜公开的。这种通过暴露打工妹的隐私来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行为,不仅是对打工妹的不尊重,而且还容易暗示读者,打工妹的生活作风不严谨。报道甚至有意透露,领取安全套的打工妹大多是未婚女青年。偏见和歧视通常被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偏见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一种态度,歧视则是一种行为。更准确地说,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sup>[2]</sup>笔者

[收稿日期] 2007-12-22

[作者简介] 许向东,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博士。

曾在某著名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交警下厂教外来工过马路》，讲的是广东佛山的一些交通事故与外来民工有关，于是当地交警就义务为农民工讲解交通规则。编辑把“交通规则”简化为“过马路”做在标题里，让人感觉农民工进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塑造出一个无知、愚笨、可笑的形象。当偏见和歧视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冷漠”，即在报道中缺乏基本的人性和感情。南方某报曾以《10米高空脚打滑 哦嘴》为标题，报道了一位打工者因不慎失足而殒命的消息。对于因生产事故导致伤亡的事件，媒体不去使用“失足”、“不幸身亡”等言辞，却以“脚打滑”和两声“哦嘴”来调侃，足以反映出该报对一位打工者生命的冷漠。

### 造成农民工报道偏见、歧视和冷漠的根源

传媒及其从业者的价值取向和媒介产品的质量受到文化环境、新闻政策和社会道德观念等外在因素，以及利益驱动、个人素养和管理机制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在报道中出现对农民工的偏见、歧视和冷漠等现象，可以说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文关怀和职业道德的缺失。

首先，群体排斥与社会分层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也称他群体，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sup>[3]</sup> 在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产生偏见的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主要因素。特别是，一个已经扎根下来的群体感到另一个群体对它存在经济上的威胁时，偏见一般就会产生。<sup>[4]</sup> 在社会转型

期，城市环境发生的巨变，市民与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同一空间，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他们都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意识，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对方视为一个与自己群体完全不同类的群体。在城市中，市民不仅是媒体的主要消费者，而且也是传媒的主要组织成员，他们代表着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控制着新闻内容的选择，影响着舆论和话语的形成。而农民工则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游离于城市之中，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加上他们对媒体缺乏利用意识及利用能力，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自然也就处于低音或无音的状态。而“失去媒体权力者，不但会造成自我定义的丧失，同时也只能接受‘被忽略’、‘被定义’的宿命”了。<sup>[5]</sup>

其次，传媒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出于生存压力，一些传媒片面地追求新奇性、人情味，使得新闻和娱乐的界限在报道上越来越模糊，正如戈德堡在《偏见》一书中写到的“记者可以不断地犯报道性错误，但是，他绝不可让观众感到乏味”。而事实的本真有时往往是乏味的、没有戏剧化的故事，因此，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一些农民工报道的视角往往侧重于新闻事实的微观细节，报道目标定位于受众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受众情感的大量涉入，突出强调事实的“卖点”，而忽略了报道的公正性、公平性。另外，广告商的介入，使得某些媒体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不是去引导受众，市场竞争越激烈，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正如阿特休尔所说：“新闻媒介好比吹笛手，而给吹笛手定调的是那些付钱给吹笛手的人。”<sup>[6]</sup> 这些因素无疑会冲击新闻伦理道德，导致媒体责任感的衰落。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促使传媒主动或被动地淡化甚至放弃自己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也诱发了媒体本身滋生偏见、歧视和冷漠的倾向。同时，对于社会中早已存在的偏见、歧视等观念，媒体不仅没有主动去抵制，反而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进而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在农民工报道中。通过带有偏见、歧视和冷漠的“符号”对受众

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sup>[7]</sup>进而在受众中延续和强化了这些观念或行为。

再次,新闻从业者缺乏人文关怀和职业道德。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良知主要是通过报道活动来体现的。但是,“从事媒介这种职业要求很高,这一行业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情景和相互冲突的效忠对象。从事新闻的人必须迅速地做出决定,没有多少仔细考虑的时间”。<sup>[8]</sup>这时,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就显得非常关键。在现实工作中,面对农民工爬高楼或爬吊塔自杀,一些记者却异化成了猎奇的高手,泯灭了应有的人性和良知,甚至采用“跳楼秀”来表述这种现象。“跳楼”是农民工在背井离乡、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一些媒体不去思考为什么农民工要用如此极端的手段、以生命为代价来争取原本属于自己的正当权益,却从强势阶层的角度考虑问题,用近乎没有人性的言辞、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指责农民工扰乱社会治安,不懂依法维权。在生存焦虑的驱使下,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有可能牺牲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来换取自身的利益。如果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和职业道德,那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所做出的选择往往只能反映出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的逐利本能。

最后,传媒缺乏报道语言的规范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道德是文化的灵魂。许多传媒缺乏报道用语的规范标准,没有弱势群体报道的规范化和条文化的详细准则可以遵守,以至于在做决定时主要依靠新闻从业者自己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理解。此种情况下,采编人员为了突出新闻的可读性、新奇性,就容易为增加噱头而违规。比如一些媒体在制作标题时为了追求“眼球效应”,随意使用动词和形容词。如《200多民工手提大棒进校讨账》、《馋嘴民工偷葡萄 几口吃掉40万》等。在规范报道用语上,《纽约时报》的《时报风格与惯用用语手册》在西方新闻界树立了典范。其中的“确保正规用语,在实用上不入下流,同时,也在避免新闻上使用不当或是俗用之语”<sup>[9]</sup>等规定也为我国传媒提供了借鉴。每

个社会群体对语言都有特殊的要求和关注,弱势群体则表现得更为敏感一些。打工仔、农民工更希望听到的称谓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而保姆则比较认同“家政服务员”这个名称。新闻报道用语的规范化、人性化不仅反映出媒体的职业水准,更能反映出人文精神在报道理念中的蕴涵程度。

## 农民工报道偏见、歧视和冷漠的不良影响

传媒的偏见、歧视不仅是传媒观察世界的结果,他们的偏见、歧视也直接影响着公众如何观察世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付诸一定的行为。新闻传媒在农民工报道中的偏见、歧视,不仅容易歪曲农民工的社会形象,也容易影响城市市民对该群体的认知,造成新的城乡二元对立,进而拉大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第一,容易破坏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新闻传媒对一个社会群体形象的展示和塑造是渗透在日常报道中的,通过对信息流量的调节控制,选择和加工信息时的态度、语气,传媒为公众建构着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对城市市民来说,亲身接触农民工的机会很有限,对该群体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文学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在缺乏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情况下所塑造的农民工的形象往往是歪曲、失真的。比如某地方新闻台曾在报道一则失窃的社会新闻时,播报人凭推测就用了“三四名民工模样的人”来描述嫌疑人。在现代社会,公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情况来做出判断。但是,媒体的某些倾向性容易使人们心目中所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较大的偏离。农民工形象的被妖魔化,容易导致新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因此,只有媒体对社会各阶层做出合乎实际的正确描述,才能促进彼此的了解,进而消除或缓解农民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第二,容易造成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固

定成见”。“固定成见”在某些地方也称作“固定形象”或“刻板印象”，指的是“一种预先判断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经验而是以某种非常固定的信念或者教条为根据。当固定形象被投射到某些人或群体身上的时候，它就成为这种信念的内容。……特别被看作是对某些群体的敌视态度的表达”。<sup>[10]</sup>而“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地形成时，我们社会注意那些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可以很确切地说，我们看东西是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或者是带着偏见的眼睛的。……凡不相容的都会受到抵制，凡不相同的都会视而不见。……许多固定的成见带着偏爱，充满了喜欢或不喜欢，附着恐惧、强烈的愿望、自豪和希望”。<sup>[11]</sup>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固定成见“具有指导整个群体乃至具体的群体成员的信息加工的预期功能。除了这类概括化的预期功能，人们对具体的群体成员（或样例）的知识也会影响对群体及其成员的判断”。<sup>[12]</sup>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也容易受到社会上已有的固定成见的影响，在报道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渗透着这种态度的影响，通过对事实的选择性陈述、对某些主题的强调和特殊价值要素的突出，进一步强化了受众对农民工的认知，成为农民工固定成见的重要塑造者之一。

第三，拉大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指的是主观的心理距离，表达的是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理解和同情的状况，是感情和心理上的亲近程度。社会距离是相互的，是在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变化的。<sup>[13]</sup>在我国，造成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的根源是长期以来城乡社会二元结构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别。此外，少数农民工在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上的相对落后，也是拉大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社会距离的因素。特别是农民工的某些失范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市民生活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经过媒体的“放大”，或者不切实际的，

有时甚至是歪曲的、污名化的报道，使得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个体认识不仅扩大为“类群”的认识，而且对该“类群”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强化，增加了对该群体的偏见、歧视和冷漠的发生率。另外，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认同，导致交往时“信任半径”的缩小，以至于双方常常怀着戒备心理，甚至有时还会相互敌视，这无疑会增加交往的社会成本，拉大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农民工报道中的偏见和歧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阶层间的偏见和歧视。作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新闻传媒有责任消除城乡居民心理上的隔阂，通过客观、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引导广大市民正确看待农民工，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农民工。

## 结束语

新闻业基本职业理念在于公正。客观、公正、真实、准确是国际新闻界为实践所证明的行业要求、新闻规律和职业道德规范。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和重要载体，理应体现人性的关怀，以充满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和法制意识，真切地关注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更应是新闻媒体人文关怀的重点。在市场化进程中，面对商业主义对新闻业的侵蚀，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能否恪守基本的职业道德，体现高尚的职业操守，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报道任何社会群体时“虽然其缺点与恶习不应该被排除，但是还应包括对其价值观、抱负和普遍人性的认可。……如果人们能接触到某个特定群体生活的核心真相，他们将逐渐建立起对它的尊重与理解”。<sup>[14]</sup>为了做到这一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要改变刻意追求“眼球经济”的做法，遵循既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的要求，遵循人的生存价值，在农民工报道中加强自律，纠正偏见，消除歧视与冷漠。

（下转第72页）

的理解》《制度、契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 18、17 页。

- [5] 胡正荣、李继东《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媒介的现实与超越——胡正荣

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 208 页。

- [7] 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制度、契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第 27 页。

## On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LIU Junr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offers the reasons and solutions according t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Regulation, Actual Difficulty, Institutions, Informal Constraints

[责任编辑: 刘小燕]

(上接第 43 页)

注释:

- [1] [美] 刘易斯·科塞等《社会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05 页。
- [2][4][美]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06 页。
- [3] [美] 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25 页。
- [5] 管中祥《传播权利、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载于《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8-21。
- [6] [美] J·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287 页。
- [7] 参见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9 页。

- [8] [美] 克里斯蒂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 8 页。
- [9] 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出版社，1999 年，第 117 页。
- [10] [英] 戴维·巴勒特《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41-42 页。
- [11] [美]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77-78 页。
- [12] 杨治良《现代人的心理迷信——偏执心理现象分析》，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71 页。
- [13] 参见何晓斌《北京市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3 页。
- [14] [美] 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15 页。

## Communicators'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Reporting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XU Xiang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ports about migrant rural work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there are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inhospitality.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causes may includ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ursuing to economic profit,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Key Words:** Migrant Rural Workers, Prejudice, Professionalism

[责任编辑: 刘小燕]